

“解诗热”现象的历史发展与 观念贡献

◎陈 辉

摘要：“解诗热”是指1986年至1994年出现的新诗解释热潮与诗歌解释理论建构现象。这一时期的解诗问题逐步走向新诗批评与诗歌理论的问题领域，解诗批评成为一种知识实践活动，解诗研究成为一种知识生产活动。孙玉石提出的“现代解诗学”是“解诗热”时期建构起来的代表性理论，“现代解诗学”充分吸收了社会历史批评对于作者的重视、“新批评”对于文本的重视与接受美学对于读者的重视，展现出鲜明的理论整合性。综合性的理论建构也促使新诗批评家们解诗观念的更新，解诗被想象成“感受-知识共同体”，解诗者需要审美感受与理智分析的综合能力。

关键词：“解诗热”；解诗学；“感受-知识共同体”

DOI:10.19290/j.cnki.51-1076/i.2024.03.025

诗歌阅读不仅是文学接受意义上广义的诗歌文化问题，也是进行诗歌批评和深化诗歌理论的重要议题。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现代主义诗潮的兴起与发展，“晦涩难懂”的阅读问题逐步成为当代读者对新诗最常见的诟病之一。“读不懂”曾多次引起读者与评论家、诗人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评论家在两者之间从事诗歌批评活动，力图揭示现代诗“晦涩难懂”的性质，找到一种沟通诗人与读者的解诗方案。因此，解诗问题一直被认为是新诗“读不懂”的阅读问题的自然延伸。

朱自清1937年发表《解诗》并在文中正式提出“解诗”这一概念，孙玉石于1986年开始提出

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①这一理论口号，都遵循从思考阅读问题到找寻解诗策略的思维逻辑。而解诗问题在1986年后有了新的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批评理论问题，一批新诗批评家与理论家参与探讨诗歌解释。而目前对于“解诗”与“现代解诗学”的历史叙述都呈现为阅读问题—解诗策略的固定模式，这一历史叙述的缺陷在于，解诗问题无法得到持续的研究关注与长足的理论发展。因此，本文在承认解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立旨于通过“解诗热”对解诗做主体性考察，从而总结出解诗的历史经验与观念贡献。

一 “解诗热”现象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朦胧诗兴起以来，如何解释一首具体的诗歌成为衡量新诗批评家有效进行批评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解诗是批评家进行诗歌批评、诗歌理论研究的基础，将一首诗解释得明白易懂，既可获得读者的认同，又可以帮助读者窥见诗人技法的奥秘。自1986年以来，解诗的诗学风尚悄然兴起，“解诗热”^②即指1986年至1994年出现的新诗解释热潮与诗歌解释理论建构现象。“解诗热”现象产生于1980年代中后期“理论热”“方法热”的时代背景，是新理论、新方法在诗歌解释、诗歌批评方面的进一步系统化实践。在大量新理论、新方法的“诱导”下，解诗逐步摆脱了传统的印象式审美赏析，实现了诗歌文本解释的本体回归与理论深化。同时期以及稍后出现的“鉴赏热”“辞典热”“细读热”“导读热”皆可视为“解诗热”现象的具体呈现形态。

“解诗热”时期被具体地认定为1986年至1994年这两个时间节点，主要是依据国内新诗解释著作出版数量情况以及解诗在新诗批评中的活跃度而决定的。这一时期大量的朦胧诗欣赏书册和诗歌鉴赏辞典的出版反映了“解诗热”时期解诗实践所达到的规模。

1980年代初，诗人流沙河先后出版了《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隔海说诗》（1985年）《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1988年）三部解读著作。张汉良、萧萧编著的《现代诗导读》、文晓村编著的《新诗评析一百首》、林明德等五人编的《中国新诗赏析》等对1980年代大陆学者进行解诗实践也具有一定影响，尤其《现代诗导读》中诗歌作品后附有少量解读批评文字的模式成为当代解诗著作的常用模式。

《名作欣赏》编辑部于1985年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诗歌名作赏析》可谓开启了诗歌解释的风气。1986年同年出版的解诗著作共有三部，分别是吴开晋、王传斌主编的《当代诗歌名篇赏析》、朱先树的《中国当代抒情短诗赏析》、周红兴的《现

代诗歌名篇选读》。1988年至1991年，新诗解释著作开始出现出版高潮，这一时期的解诗著作多以“鉴赏辞典”“赏析”“导读”“欣赏”为后缀。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90年），2007年改版增加为三套书，分别是《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7）》《中国现代诗导读（1937—1949）》《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公木主编的《新诗鉴赏辞典》一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1年至2002年几乎每年一版，2013年改版为《新诗鉴赏辞典（重编本）》，2017年再次改版为《新诗鉴赏辞典（新一版）》，衍生辞典有《新诗三百首鉴赏辞典》，2008年至2021年也是多次改版再版。自1986年到1994年年后也时常有新诗解释著作出版，但已不复“解诗热”时期的盛行。

在解诗理论建构方面，“解诗热”时期的理论成果相对较少。孙玉石的《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是本时期第一篇关于诗歌解释的理论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建构中国新诗的诗歌解释理论，并详细地阐释了“现代解诗学”的历史渊源、理论内涵与解诗原则。随后，孙玉石在1980—1990年代陆续完成了一系列的解诗理论文章，如《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对话”：互动形态的阐释与解诗》《论闻一多对新诗神秘美的构建》等，最终集结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③一书。王长俊于1994年出版了系统性诗歌解释专著《诗歌释义学》，该书运用了阐释学的一般原理，对诗歌文本的意义解释进行了系统研究。尽管在很长的时期内，某些关于解诗的共识性原则和方法范式尚未形成，^④但这一时期的新诗解释热潮已然完成了它开拓性的历史使命。

1994年以后，解诗著作出版数量逐年锐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新诗解释著作是洪子诚于2002年主编出版的《在北大课堂读诗》。该书是北京大学课堂解诗实录，集中展现了21世纪初北大师运用细读法进行新诗解释的实践情况，对解诗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启示作用。在理论建设方面，1994年以后出版的解诗理论著作相比于“解诗热”时期更为丰富，但整体上仍呈现为零星式出现的特征，并未形成理想中的解诗理论建构热潮，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王太顺的《解诗学》、李咏吟的《诗学解释学》和孙绍振、孙彦君合著的《文学文本解读学》。

解诗问题在“解诗热”近十年的发展中，解诗方法从印象式审美鉴赏，到恢复传统的意象解诗、细读法解诗，再到开放式细读解诗。一方面，新诗批评家历史性地解决了新诗的认知解释问题。解诗成为了新诗批评的有机组成部分，解诗策略与解诗观念，使批评家与读者在面对新诗晦涩的认知问题时，不至于束手无策，面面相觑。正如孙玉石所言：“众口一声简单地认为现代派诗‘晦涩朦胧’，‘不好懂’而加以否定的时代，由于现代解诗学的出现便告结束了。”^⑤另一方面，解诗的发展促使了解诗观念的当代转型。解诗问题迅速从公众层面的阅读问题走向新诗批评与诗歌理论的问题领域。解诗作为新诗批评的组成要素之一，解诗批评已然成为一种知识实践活动，解诗研究已然成为一种知识生产活动。这一时期的解诗策略成为了今后最基本的新诗批评手段，这一时期的解诗观念也向今后的新诗批评家们提出了更高的解诗批评标准。

二 解诗问题的发展

解诗是伴随着新诗现代化出现的问题，“中国现代解诗学是新诗现代化趋向的产物”^⑥。新诗愈是朝着现代主义发展，跨越的步伐愈快，新诗面貌的变化愈大，关于新诗“读不懂”问题、解诗问题的讨论也愈加剧烈。因此，解诗理论才能在学界对解诗问题的持续探索中诞生。解诗起源于新诗现代化的阵痛是历史的真实，但另一重要现象则是历史语境下解诗自身的主体性发展。

解诗，作为新诗批评一种特殊的知识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尚待完善的理论形态，所隶属的问题类型及自身的发展领域并非固定不变。解诗问题及应对策略本身便可构成一部新诗批评史，据此可见其复杂性。在当下，解诗已逐步发展为一个可容纳各方讨论、涵盖诸多领域的广阔的知识空间。冷霜指出：“谈论这个话题不应只局限在写作者、批评家和读者所构成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其实是很抽象的范围之内，也需要把诗歌阐释与接受活动所由发

生的更广阔的场所一并考虑进来，需要对诸如诗歌教育与传播状况等方面予以考察，才有可能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认识。”^⑦若依冷霜之见，讨论解诗要从诗人写作、学者批评、读者接受及诗歌教育、传播情况等多方面进行考察，那么，解诗中某一问题都会牵扯到多方的实际可操作性，这使得问题的讨论空间巨大却难有定论。这一叙述表明了解诗问题的复杂性，很难在某一历史时期得到盖棺定论。或许应大方地承认，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新诗“读不懂”问题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妄想。解诗问题的发展消除了新诗现代化所带来的阅读焦虑，也带动了新诗批评与新诗理论的进步。实际上，解诗问题的变化过程亦是新诗解释的知识积累过程。

在1930-1940年代，尽管每一次关于新诗“读不懂”的责难都有具体的历史语境与生发话题，但在对新诗的诸多诉求中有一条最为重要，即对于新诗解释批评的呼求。新诗现代化要求新诗批评的现代化，从而使解诗问题从文学观念的分歧与文化立场的分歧中挣脱出来，逐步过渡为一种新诗批评问题。在此意义上，朱自清等批评家、理论家卓有成效的解诗努力，使解诗从读者与作者之间关于“懂与不懂”文学观念的两方拉锯，转变为切实可行的解释批评实践。解诗本身成为一个主体性问题，开始流转于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批评家笔下，解诗成为那一代批评家们进行批评实践的基础。与上述情况相似，随着朦胧诗“横空出世”，诸如“看不懂”的言论在1980年代初便又热闹起来。

1980年代关于新潮诗“懂与不懂”的问题引发了文学家、批评家的论争，新诗史、新诗史料都充分展现了这次论争的状况。^⑧“几年来被称为‘朦胧诗’创作潮流的急剧发展和嬗变，将对新诗真正繁荣的期待和艺术探求的困惑感一并带到批评家和诗人面前，诗人的艺术探索与读者审美能力之间的鸿沟，又像三十年代现代派诗风盛行时那样成为新诗自身发展的尖锐问题。”^⑨遵循着相同的历史逻辑，现代主义诗歌风格带来的新诗阅读问题引发了读者一轮又一轮的热议讨论，这一讨论热潮逐步积淀为对新诗批评、新诗理论的挑战，最终转化为部分批评家进行解诗探索、进行解诗批评实践的动

力。发生于1986-1994年间的“解诗热”现象便是新诗批评界对于新潮诗“懂与不懂”论争的一次集中回应。大量出版的新诗鉴赏辞典、新诗赏析读本与几部由高校课堂讲解现代诗实录出版的诗歌导读，都展现了这一时期解诗的热潮，同时也表明学界由关于现代主义诗歌“懂与不懂”文学观念上的理论争鸣转变为实绩突出的解诗批评实践。

在传统的美学观念中，解诗的重要性并不突出。而随着“解诗热”活动的展开，批评家们开始重视新诗解释与解诗方法研究，这使由来已久的新诗阅读问题转变为对诗歌艺术本质的重视。在“解诗热”初期，批评家们多将现代诗经典文本作为自己解诗批评的对象，而较少将新时期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作为自己解释的对象，这实际是用历史的方法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主张，他认为单一的价值判断、审美赏析无法解决现代主义诗歌难懂的问题，反而给指责者更多的口实。同时，新诗课堂不能“仅靠宏观的理论分析”与诗歌流派梳理，新诗阅读问题应转入切实的文本分析，“弄懂每个作品的整体思路、意象蕴藏、文句关系和书写意义”。^⑩由此，一方面，孙玉石继承了朱自清等人的解诗观念，历史性地解决了现代诗晦涩难懂的问题，并对现代主义诗歌给予了艺术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他从文本解释出发，回应了1980年代出现的诸如朦胧诗论争等现代主义诗歌阅读问题，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是在用历史来为当时的诗人、读者和批评家提供一种启示，呼吁重新建立一种以强调和尊重诗歌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为核心思想的诗歌审美和批评方式”。^⑪这种历史与现实相互照进的理论建构思想对于建立新诗批评新模式无疑是有益的。

与1930-1940年代解诗实践相比，“解诗热”时期的解诗实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1980年代的批评家们大多能辩证地看待关于“懂与不懂”文学观念的论争，能将文学观念的论争转变为具体的批评工作。他们在批评工作中，抛弃了以往解诗中单纯的审美赏析，而转为学理性更强的理性分析，体现出较高的理论意识。同时，解诗问题在1980年代批评家的手中发展到更高阶段，即理论讨论的阶

段。新诗批评家与理论家开始追求解诗理论的系统化建构，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解诗学”、王长俊的“诗歌释义学”、王太顺的“解诗学”、李咏吟的“诗学解释学”、孙绍振的“文学文本解读学”等，虽各位学者对于解诗理论的命名不一，但都是这一建构的体现。解诗问题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新诗批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理论问题。文艺理论家们利用中西方理论资源，围绕作者、文本、读者、世界等要素全面地构建体系化的解诗理论。

从现代主义诗歌“懂与不懂”引申出来的解诗问题具有周期性，本身与新诗阅读、新诗教育、新诗批评、新诗传播等诸多话题都互有关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解诗问题也有自己清晰的发展脉络。1930-1940年代解诗问题由阅读问题逐步演变为新诗批评问题，“解诗热”时期解诗问题遵循相同的历史逻辑，进一步由新诗批评问题发展为文艺理论问题。由此可见，伴随着每一次新诗“懂与不懂”的论争，学界都采取了积极回应的态度，一方面回应了公众对新诗阅读问题的期望，缓解了公众的新诗阅读焦虑；另一方面在促进新诗批评范式转换的同时，将解诗问题研究推向了更高水平。实际上，公众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讨论也成为了学界进入解诗问题、推进解诗研究的主要契机之一。

三 解诗理论的整合性特征

在“解诗热”时期，解诗问题既是新诗批评解释问题，又是文艺理论阐释问题；解诗，既是一种知识实践活动，又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相较于解诗批评实践的火热，作为知识生产的解诗理论建构呈现出零星分散的特点，但仍是“解诗热”的重要表现之一。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任何知识都是建构起来的。解诗作为一种偏向于应用实践的知识也不例外，它有自身的基础理论来源与历史的建构过程。

孙玉石等解诗理论建构者立志于建立中国的现代诗歌解释学，在总结本土解诗观念的基础上，又借鉴了1980年代以来大量涌入国内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在这其中，阐释学与接受美学对建构中国

的解诗理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实际上，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的两次重大转变在中国解诗观念、解诗理论的建构上都产生过影响。1930-1940年代朱自清等人正好经历了西方文学理论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从研究作家到研究作品文本。这使朱自清、袁可嘉等人的解诗观念更倾向于“新批评”理论，而在新诗解释批评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印象批评与文本细读并行。“解诗热”时期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学理论第二次重大转变的影响，从研究作品文本转移到研究读者接受。在解诗理论的建构上主要表现为对读者接受理论的重视与整合，而在新诗解释批评实践中更多表现为意象阐释与细读法批评。

“解诗热”时期解诗理论家们既有实现中国传统诗歌解释理论现代性转换的意识，又对吸收大量涌进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抱有热情。在进行解诗理论建构时，他们不得不考虑阐释学中对于意义和价值问题的阐述与接受美学中对于读者接受的重视。1980年代，阐释学相关理论文章与理论著作相继译介进国内，中国理论家们也写出了一系列代表性的阐释学理论著作，如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1986年）、殷鼎的《理解的命运》（1988年）、王一川的《意义的瞬间生成》（1988年）、程文超的《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1993年）、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1998年）等。这些学者广泛地讨论了理解、理解与意义、意义的特征、解释目的、阐释方法、阐释循环、解释范式等理论问题。理论家在进行解诗理论建构时，首先需要考虑理解、解释与意义的复杂关系，因此，阐释学基本上构成了解诗基础理论的思维基底。

在1980年代译介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中，接受美学对建构解诗理论的冲击最大，接受美学直接与意义的解释，尤其是与文学文本意义的解释相关。国内最初出版的解释美学研究著作有朱立元的《接受美学》（1989年），丁宁的《接受之维》（1990年），龙协涛的《文学读解》（1991年）《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1993年）《读者反应理论》（1997年），张杰的《后创作论》（1992年），金元浦、杨茂义合著的《读者：文学的上帝》（1996年），金元

浦的《文学解释学：文学的审美阐释与意义生成》（1997年）《接受反应文论》（1998年）等。接受美学从读者的审美接受出发，以意义解释为中心，整体把握文学四大要素，体现出强大的文学理论整合性。此外，接受美学本身关注的便是读者的阅读问题，这对于理解意义阐释与“读不懂”问题具有直接的针对性，且该系统理论关于读者与文本解释的论述极为丰富，故而十分适合于解诗理论的整体建构。譬如，周晓风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思路建构了“现代诗歌解释学”的理论框架。^⑫同时，接受美学对于这一时期的解诗理论建构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一方面，接受美学有助于现代解诗理论对中国古代阐释观念的现代转换，张隆溪等学者站在读者接受的理论角度，将“诗无达诂”理解为中国古代学者对诗歌多义性、阐释方法、阐释指导思想等问题的理论解答^⑬；另一方面，接受美学对读者因素的重视，又冲击着新诗批评家们固有的解诗策略，迫使他们形成新的解诗观念。在这方面，孙玉石提出的“中国现代解诗学”最能代表解诗研究的理论特征。

所谓“中国现代解诗学”实则是孙玉石根据现代文学三十年解诗实践与解诗观念的历史材料建构起来的全新的解诗理论，其理论精髓主要体现为“三三原则”。三大理论内涵包含：“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复杂性的超越，是对作品本体审美性的再造，是对作品本体理解歧异性的互补”^⑭，是从文本特征、文本审美性与文本理解的角度对“解诗学”的本体认识。具体的解诗观念或解诗观念方法是三大公共原则：“正确理解作品的复义性应以文本内涵的客观包容性为前提，理解作品的内涵必须正确把握作者传达语言的逻辑性，理解或批评者的主体创造性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意图的制约性。”^⑮孙玉石充分吸收了社会历史批评对于作者的重视、“新批评”对于作品文本的重视与接受美学对于读者的重视，力图在作者、作品、读者三大文学要素中寻求一种相互结合的平衡与统一。基于对读者的重视，他充分重视批评主体的“理解趋向的创造性”；而基于对文本事实的尊重，他又提出“文本内容的客观性”，后者既要遵循语言分析与意象释

义的文本事实，又要“正确把握作者传达语言的逻辑性”。故“现代解诗学”在重视批评主体的创造性的同时，“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意图的制约性。”孙玉石提出的“三三原则”体现出这一时期解诗理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他以朱自清等人的解诗观念与解诗实践发展而来的解诗理论为基础，充分吸收了1980年代以来西方新进文学理论思想，将各种西方文学理论中合理的部分都化为已有，展现出强大的理论整合性。

“解诗热”时期以来建构的解诗理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活动，需要面对1980年代译介进来的以阐释学、接受美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冲击。阐释学、接受美学成为这一时期解诗理论建构重要的影响因素，理论家们在解诗研究中需要回应他们对于这两大理论的认识。这一文化背景使他们的解诗理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整合性，综合性的理论建构也使新诗批评家们拥有更加综合开放的解诗观念。

四 “解诗热”的观念贡献

1986-1994年的新诗解释热潮缓解了现代主义诗歌“晦涩难懂”的阅读问题，更重要的是，解诗批评实践与解诗理论建构共同促进了批评家们解诗观念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引导着解诗方法的更新，相反，观念的固守也限制着解诗方法的运用。在中国新诗史上，讨论诗歌观念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两种属性：“一方面，‘观念’被当做某种自我表述的话语策略，而用于针对某一对立面，因而具有‘主观’性；另一方面，‘观念’并非虚无之物，其创生、构建亦以一定时代意识为基础，并得以表达而凝固为文学史实践，其过程亦再现了这一时代对‘新诗’这一文类的看法与构想。”^⑩聚焦到“解释热”那段历史时期，谈论“解诗热”活动的观念贡献需要一定范围的学界共识，主要在“客观”的层面讨论。这种观念贡献表现为新诗批评家与解诗理论家对解诗这一知识生产实践活动的主要看法与构想。

观念贡献作为一种思想结果，只能在“解诗热”时期之后被表达呈现。即使被表达也并不代表这种观念成为事实，它也可能是今天仍希冀实现的

理想状态。姜涛认为新诗研究者需要更为综合的解诗能力：“不仅传统的印象式的审美感悟力被看成是新诗研究者必需的素质，对复杂精微的形式、观念的敏锐辨析力，更是被普遍呼吁的能力。”^⑪一般而言，“印象式的审美感悟力”往往被理解为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歌不可解释或无需解释要素诸如诗情、诗味、诗境的审美感受能力，“对复杂精微的形式、观念的敏锐辨析力”则多被理解为西方形式主义对诗歌可解释或需要解释要素诸如语义、结构、语境的审智分析能力。解诗者包括新诗批评家，无疑需要审美感受与审智分析的综合能力。

耿占春描述了当下新诗批评家的专业素养面貌，也提出了解诗能力的要求：“他们始终都更愿意具有一种自觉的细读训练和良好教养的诗学敏感性，不无历险性地阐释诗歌文本的修辞方式以及感性经验、感受力及其话语表征，以及对个人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学诸领域相关论域的分析。”^⑫“自觉的细读训练”在于解决新诗的话语表征问题，“良好教养的诗学敏感性”在于在激活感性经验中分享审美感受。这是诗歌解释的基本能力，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内部研究”的能力。以此为基础，新诗批评才可实现“对个人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学诸领域相关论域的分析”，才可向外阐发抵达“外部研究”的再解读。

不论是姜涛提出的“对复杂精微的形式、观念的敏锐辨析力”与“印象式的审美感悟力”，抑或是耿占春提出的“自觉的细读训练”与“良好教养的诗学敏感性”，都要求当代解诗者与新诗批评家拥有一种解释或阐释的综合能力。前者一般被理解为一种审智分析能力，属于专业知识能力的范畴；后者则被理解为一种审美感受能力，属于审美感受能力的范畴。解诗，被要求成为一种“感受-知识共同体”。对这一解诗“共同体”的提倡便是“解诗热”活动在解诗观念思想上的一大贡献。不同个体贡献自己的知识，从而形成大多数人认同的知识谱系，而解诗形成“感受-知识共同体”的知识综合体认同最早见于孙玉石的相关论述。孙玉石在分析理解与欣赏的关系时，便初步表露了解诗需综合审美感受与理性理解的观念：“理解和欣赏虽然不

是一回事，但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理解是进入欣赏的准备，欣赏是实现理解的成果。中国现代解诗学，以理解作品为前提，在理解中实现对作品本体的欣赏和审美判断。”^⑨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有割裂解诗作为感受与知识综合体的嫌疑。孙玉石也强调“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审美性的再造”。一方面，“现代解诗学”需要通过理性的技术化手段“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弄清每一个意象、比喻（显喻和暗喻）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每行诗句和每个词语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解诗又是对于作品审美特性再创造的过程”，解诗本身就“包含了读者与批评家对这种审美再造能力的无限追求”。^⑩这就需要读者与批评家卓越的审美感受能力。

解诗的“共同体”观念还应落实到解诗批评的实践层面。解诗应“包括语义阐释、意象阐释和审美阐释等，把阐释从注重诗歌外部因素引导到注重内部因素，以此阐发诗歌艺术的审美价值”^⑪。“语义阐释、意象阐释和审美阐释”三项任务在解诗批评中同时抵达，这便是解诗作为“感受-知识共同体”在实践层面的体现。

注释：

①《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中国新诗批评史札记之一》写于1986年8月，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

②“解诗热”这一概念最早出自周瓚的著作《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参见周瓚：《结语批评“批评家”》，《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68页。

③《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写于1994年3月，

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对话”：互动形态的阐释与解诗》写于1994年，刊于《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论闻一多对新诗神秘美的构建》刊于《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参见张桃洲：《“解诗学”视域下的新诗阅读问题》，《文艺研究》2022年第3期。

⑤⑥⑨⑭⑮⑰⑱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中国新诗批评史札记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

⑦钱文亮、冷霜、陈均、姜涛：《当代诗歌阅读何以成为问题》，《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8日。

⑧参见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

⑩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载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

⑪张洁宇：《“解诗学”为我们带来什么？》，《新诗评论》总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⑫参见周晓风：《现代诗歌解释学：可能与现实》，《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⑬参见张隆溪：《诗无达诂》，《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⑭陈均：《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⑰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⑱耿占春：《当代诗歌批评：一种别样的写作》，《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⑳李丹：《论现代解诗学对诗无达诂说的推进》，《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赵雷